

菲律賓在東亞的影響 (1565-1593)

羅德里格斯*

在西班牙人來到菲律賓最初的幾十年期間，東亞既複雜而又活躍的地區環境確立了其發展座標，制約並部分地塑造了菲律賓殖民模式的雛形及其影響。當時的所有文獻都證實了德尼斯·倫巴第 (Denys Lombard) 曾描述的當時東亞地區的狀況：

最初來到這裡的伊比利亞人遇到的是一個表面上似乎對他們的事業非常有利的環境：海上貿易得到全面加強，“各國商業僑民”雲集，(……) 城市的國際化……⁽¹⁾

下面摘錄的引用語中關於“中國海地區的地中海”的觀點正是基於東亞的這種地區環境，這一頗具創意的觀點是西班牙的日本史專家何塞·路易斯·塔拉德里斯 (José Luís Taladriz) 在大阪 (Osaka) 提出的：

耶穌會的何塞·德·阿科斯塔 (José de Acosta) 神父在《印度的自然歷史和倫理 1590》(História Natural y Moral das Índias 1590) 中說：“到目前為止，在新世界中，還沒有像歐洲、亞洲、非洲……那樣的一個地中海。”費爾南德·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 在他的著作

《地中海……菲利普二世時期》(La méditerranée ...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中曾強調這些話。希望能夠出現一個由朝鮮半島、日本、中國、印度支那、馬六甲 (Malaca)、印度尼西亞、馬魯古 (Molucas) 和菲律賓組成的“亞洲地中海”。當傳統上的地中海以一條平行線為軸的時候，“亞洲地中海”則幾乎是一條縱軸，甚至幾乎與劃分西班牙和葡萄牙影響範圍的子午線相重疊。⁽²⁾

在這個“亞洲地中海”的大背景下，我們必須強調的是西班牙人在東南亞伊斯蘭蘇丹國（特別是渤泥 [Bornéu] 和馬魯古群島）、中國、日本和遠東葡萄牙飛地的影響。我們不能忘記，當西班牙人到達的時候，在菲律賓沿海地區的居民中已經有不同民族和國家的穩定的商業僑民。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菲律賓已經通過與中國和日本保持着貿易往來關係的伊斯蘭蘇丹國參與東南亞貿易網。自從1565年米格爾·洛佩斯·黎加實比 (Miguel López de Legazpi) 的遠征隊來到菲律賓群島，見證了在西班牙人到達之前，馬尼拉已經有來自中國福建省的精明商人⁽³⁾和該省的居民在此定居。有一些是來自日本的中國移民，在日本南方的九州島 (Kyushu)，

* 羅德里格斯 (Manel Ollé i Rodríguez)，1962年出生於巴塞隆納，曾就讀於巴塞隆納大學 (Uni. de Barcelona)、蓬佩·法布拉大學 (Uni. Pompeu Fabra) 和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蓬佩·法布拉大學 (巴塞隆納) 東亞史教授，專門從事16-17世紀西屬菲律賓殖民地與中國和日本的關係以及西班牙對中國認識的研究，出版著作《中國的發明。16世紀菲律賓的認識和戰略》。



他們與當地的葡萄牙耶穌會士建立了聯繫，也有來自那裡的日本商船，其中一些也已經在呂宋（Luzon）的沿海地區建立了小的僑民社會。⁽⁴⁾

顯而易見，西班牙殖民化最初僅僅出現在菲律賓群島。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菲律賓本地的經濟基本上以傳統的水稻種植為基礎。菲律賓群島自身沒有能力在短期內、在沒有深刻的結構轉變的情況下，產生出卡斯蒂利亞人（Castelhano）期望其能夠控制的那樣的經濟繁榮。它既沒有墨西哥的金礦，也沒有智利的銀礦，既沒有中國的絲綢，也沒有馬魯古群島的香料。⁽⁵⁾儘管土地肥沃，卻並不具備有利於立刻產生財政收入和實現贏餘生產和利益的農業開發方式，因為，這裡的土著居民居住分散而且不易接近，要讓他們“定居”在城鎮以便徵稅並從事農業開發以增收⁽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在缺乏貿易和稅收空間的環境裡，發掘與菲律賓群島周邊的外來商業僑民進行貿易互動的潛力，這成為菲律賓的西班牙人生存並使殖民化贏利至關重要的途徑，從而保證馬尼拉這艘巨輪的海上貿易航線的迅速鞏固，並建立起具有雙重特色的菲律賓殖民模式，即一方面着眼於從宗教上加強對群島的控制，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海上商路的貿易，着眼於馬尼拉貿易大都會的繁榮，使之轉變為一個由卡斯蒂利亞精英領導的中國人的城市。

與渤泥的接觸

1565年，西班牙人入侵菲律賓群島。關於這個時期，我們找到了這裡已經有來自中國的產品的證據，這些產品——在西班牙人入侵這個地區之前——通過呂宋與渤泥的貿易航線，特別是通過渤泥和馬尼拉的伊斯蘭蘇丹國，經蘇祿海（Sulu），被運到呂宋和群島的中部地區（宿務 Cebu、保和 Bohol……）。⁽⁷⁾渤泥的商人們成為在菲律賓地區批發和傳播直接用大帆船運抵這個島的中國產品的代理人。⁽⁸⁾

在位於菲律賓群島中部地區的保和島，米格爾·洛佩斯·黎加實比遇到了一支渤泥商人船隊，這些商人證實當地在西班牙到來之前已有與中國的貿

易往來，並且證實了有關中國大帆船帶來的貨物種類、渤泥商人在呂宋銷售中國貨的機制以及如何把這些貨物引入各島市場的資訊。由於這些船行蹤詭秘吃水淺，所以被稱為“中國帆船”。我們在《1565年5月米格爾·洛佩斯·黎加實比將軍率領陛下的海軍在發現西方群島的旅途中發生的事件和行程一覽表》裡找到這條貿易航線的證明資料：

摩爾人說過，他們從渤泥帶回了來自中國的鐵、錫、瓷器、當地的銅質鐘、安息香⁽⁹⁾、印度的繪毯、煎鍋、鐵鍋，這種鐵像玻璃一樣易碎（……）。這位摩爾人告訴將軍說，當時在武端（Botuan）有兩艘呂宋的帆船，倒賣黃金、蠟和奴隸，他們帶來的與渤泥的船帶來的貨物幾乎是一樣的，都是來自中國的產品；而且，由於他們帶來的都是中國貨，在這些島上，人們把渤泥的船稱為中國帆船，因此，來自呂宋的船也被叫做中國船。然而，事實上，中國帆船並不來這裡，因為他們的船非常大，無法在這些島之間航行；每年，他們都到渤泥和呂宋，在那裡，從那些中國船上購買他們帶到這個群島的貨物。摩爾人還說，呂宋島在渤泥的南面，渤泥人不到武端來，這與某場戰爭有關，過去，曾有一些渤泥人死在那個港口。⁽¹⁰⁾

關於渤泥地區和菲律賓地區之間通過蘇祿海保持的這種聯繫，在西班牙人第一次入侵菲律賓時期，我們掌握了一份奇特卻非常有趣的標明年代為1566年的葡萄牙文件，它是在安德列斯·德·烏爾達聶塔（André de Urdañeta）和黎加實比的遠征隊到達宿務僅僅幾個月後，由耶穌會士麥爾什奧爾·卡爾內羅（Melchior Carneiro）在馬尼拉寫的，他兩年以後移居澳門、後來在那裡成為中國和日本的第一位主教。⁽¹¹⁾卡爾內羅在給當時的耶穌會總監、巴倫西亞人弗朗西斯科·德·博爾扎（Francisco de Borja）的信中寫道，在馬尼拉的葡萄牙人聽說有一支卡斯蒂利亞遠征隊來到了那個地區，他對此感到擔心。這也許是葡萄牙人對於在他們領地上出現入

◁ 葡萄牙地圖學家安東尼奧·桑切斯（António Sanches）繪製的東南亞地圖（1641年）

侵者的態度的最早的文件之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份文件簡短、籠統地證實了“加斯科”（指黎加實比）船長與渤泥的穆斯林建立了聯盟，以及葡萄牙得益於每一條貿易十分活躍的東亞航線。卡爾內羅預言，自從卡斯蒂利亞人入侵該地區，葡萄牙-西班牙將進入一個對抗時期，這可能嚴重損害耶穌會的傳教事業：

當我寫這封信的時候，前往解救馬魯古的一個船隊首領⁽¹³⁾的船⁽¹²⁾來到了這個港口，他們給印度總督帶去消息說，有四艘來自新西班牙(Nova Espanha)的卡斯蒂利亞船到達了這個地區，正準備在離丁香群島⁽¹⁴⁾ (ilhas do cravo) 北面10度的一個叫做棉蘭老島(Mindanao)的地方建立一個要塞。這裡離丁香群島150里格。他們的船隊首領名叫加斯加(Gasca)⁽¹⁵⁾，是所有這些西方人的船隊首領，並且，那個島已經與這個群島的其它島嶼結成同盟，當葡萄牙船隊首領來到那個叫渤泥的島時，人們因為已經與卡斯蒂利亞人結盟而不願意給他提供補給。這艘船帶來的其它消息還說，葡萄牙船隊首領放棄了他本來的計劃，或者說，把他的原計劃延後，要去與那些人交涉，因為那是葡萄牙人的地盤⁽¹⁶⁾，並決心把他們從那裡驅逐出去⁽¹⁷⁾。現在，他應當已經到達那裡了，因為從我現在正要離開的渤泥到他們所處的棉蘭老島相距60里格。⁽¹⁸⁾我們這邊心存疑慮，不知道那些人是菲利普國王派來的，還是新西班牙總督派來的。⁽¹⁹⁾因為我擔心從此厄運和戰爭將要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間降臨，這對於整個基督教來說是一場災難，我認為有必要把這種情況通知神父大人，因為我認為，現在，除了使聖上通過地理測量的方法，查明這些君主之間的界限之外，我們不能為天主做任何事情，在搞清楚這個問題之前，我非常懷疑他們之間能有永久的和平。如果發生戰爭，那麼，會持續許多年，因為葡萄牙人在這個地區的能量非常之大，他們肯定不願意放棄馬魯古的香料、日本的銀和

中國的財富、巽他(Sunda)和班達(Banda)的藥材，因為涉及的錢高達一康托半的黃金。⁽²⁰⁾

菲律賓的西班牙人瞭解到渤泥的蘇丹國在該地區貿易航線上的重要作用之後，立刻把渤泥作為其擴張活動和地區控制的焦點。因此，吉多·德·拉維薩雷斯(Guido de Lavezares)臨時總督在1574年7月17日和30日內容相同的信中建議王國展開一次軍事行動，以便在渤泥島建立一個東方貿易殖民地。⁽²¹⁾

然而，卻是他的繼任者弗朗西斯科·德·桑德(Francisco de Sande)在1578年3-5月間，依靠數百西班牙人和一千多名米沙鄢群島(Visayan)的土著人⁽²²⁾實現了這個事業。這次軍事行動的藉口是幫助王國的一位當權人物的兄弟，即西班牙文獻中被稱為西雷拉(Sirela)的人，他希望廢黜他的兄弟並表示願意承認菲利普二世，但是，交換的條件是使他自己重登王位。⁽²³⁾從理論上說，弗朗西斯科·德·桑德的目的是在於獲得渤泥的蘇丹國的好感，以便在那裡傳播基督教⁽²⁴⁾，但是，他的中期目標則在於獲得對這個地區的控制權，並且避免渤泥與蘇門答臘島(Sumatra)北方將馬六甲的葡萄牙人視為對頭的亞齊(Achém)蘇丹國結盟。在與亞洲伊斯蘭的衝突中，他的聖戰心理已經感到了在穆斯林蘇丹國地區擴張所面臨的迫在眉睫的危險，而在棉蘭老島，蘇丹國已經開始軍事抵抗菲律賓的西班牙人。

弗朗西斯科·德·桑德對渤泥的遠征是一次軍事勝利。西雷拉重登王位，但是，西班牙遠征軍成員卻受到了傳染病的沉重打擊。遠征軍中一位重要成員、曾經於1575年作為使臣到過中國福建的奧古斯定教派的馬丁·德·拉達(Martín de Rada)請求弗朗西斯科·德·桑德總督允許遠征軍立刻返回馬尼拉。在返回途中，1578年6月，馬丁·德·拉達在船上染上瘟疫去世，終年45歲，遺體被海葬。

馬魯古群島 (1565-1593)

1564年，新西班牙立法會頒佈的訓令中包括了征服菲律賓群島，僅僅把馬魯古群島作為有待征服

的亞洲地區，因為當時這個群島被認為是葡萄牙人的保留領地。所有關於與馬魯古群島進行直接接觸以及相關的動議都被束之高閣，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1581年菲利普二世國王登上葡萄牙王位。1575年年底，當駐軍船隊首領被迫向巴哈安拉（Baab Ullah）國王投降、葡萄牙人從此退出了德納地島（Ternate）的時候，葡萄牙殖民勢力在馬魯古群島被大大削弱了。祇有安汶島（Ambón）的要塞得以完全保留。1578年，葡萄牙在該地區的最高代表桑丘·德·瓦斯康塞羅斯（Sancho de Vasconcelos）接受蒂多雷島（Tidore）國王——德納地島國王的夙敵——的邀請，在該島建立了一座要塞，此舉雖然不能產生多麼大的影響，卻與他的對手德納地島形成了對抗局面。由此，葡萄牙人捲入了這一地區無休止的衝突之中，而由於其本身在當地軍事力量薄弱，他們沒有從中獲得絲毫利益。由於葡屬“印度國”的首都果阿無力為他們提供必須的軍事支援，馬魯古群島葡屬地區的總督們怨聲載道。⁽²⁵⁾駐紮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正是利用了（葡萄牙人）遠離總督所在城市的這種困難局面，開始重新實現他們對香料的夙願。因此，在這個背景下，出現了菲律賓和新西班牙全面入侵東亞各地特別是中國的征服計劃和建議。例如，我們看到，1581年，在與胡安·貢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一起領導了失敗的晉見中國皇帝的計劃之後，奧古斯丁教派的弗朗西斯科·奧爾特加（Francisco Ortega）在他提出的一系列軍事和傳教行動中，對征服馬魯古群島重要性的認識：

上帝使陛下成為葡萄牙的國王，賜予陛下其它國度和領地。（……）陛下用如此神聖的業績報答聖上過去、現在和將來所做之一切，並窮畢生之力擴大陛下的王國和領地，並永遠統治下去。說至此，尊敬的陛下，由於許多人來到這個群島，陛下可以命令總督派人佔領馬魯古群島，那裡有香料，如陛下知道，在除了服務於上帝、使那裡的居民皈依基督教、保護那裡的基督徒（如果有的話）之外，陛下的財富將

因此而極大地增加，因為僅從菲律賓群島，也就是說，從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現的那些群島上獲得的並不多，而是相反，陛下國庫的開支每天都在增加。⁽²⁶⁾

很快，貢薩羅·龍基洛·德·佩尼亞羅薩（Gonzalo Ronquillo de Peñalosa）開始採取措施開展馬魯古群島的事業：1582年的3月和4月，弗朗西斯科·德·杜埃尼亞（Francisco de Dueñas）率領卡斯蒂利亞第一支遠征軍開赴馬魯古群島，當時的主要目的是，通告在該地區的葡萄牙人知悉菲利普國王已經入主葡萄牙王室，同時，也為了瞭解當地的軍事形勢。1582年9月，佩尼亞羅薩派往馬魯古群島的第二支遠征軍在他的侄子胡安·龍基洛（Juan Ronquillo）的率領下從馬尼拉啟程。這次遠征是應蒂多雷島的葡萄牙首領烏戈·德·阿贊布雅（Diogo de Azambuja）的明確要求進行的，具有很大的規模：集合了大約一千五百名卡加延（Cagayán）和邦板牙（Papanga）的菲律賓人和三百名卡斯蒂利亞人。他們乘坐的是三艘大船和五十多隻當地的小船。一抵達馬魯古群島，他們就控制了木迪葉爾（Mutiel）島。在德納地，遠征軍與城市守軍發生了戰鬥並輕而易舉地打敗了他們，但是，一種瘟疫開始在士兵中流行，甚至影響到遠征軍四分之一的人，阻礙了卡斯蒂利亞人對1571年葡萄牙人失去的香料之路上關鍵點的切實控制。遠征軍被迫無功而返，於1583年回到馬尼拉。⁽²⁷⁾卡斯蒂利亞人對馬魯古群島的第二次軍事遠征發生在1584年4月，擔任遠征軍船隊首領的是佩德羅·薩爾門多（Pedro Sarmiento）。為征服德納地島而經過幾個月的失敗嘗試之後，遠征軍於1584年11月回到馬尼拉。卡斯蒂利亞對馬魯古群島的第三次軍事遠征是在胡安·德·莫龍（Juan de Morón）⁽²⁸⁾指揮下進行的，遠征軍於1585年3月從馬尼拉出發，五個月以後再次無功而返。⁽²⁹⁾

卡斯蒂利亞對馬魯古群島的第四次軍事遠征的規模比前幾次更大，在經過精心準備之後於1593年開始。菲律賓總督決定親自掛帥出征。但是，在半



16世紀的航船（Brueghel）

途當載着戈麥斯·佩雷斯·達斯馬利尼亞斯（Gómez Pérez Dasmariñas）總督前往宿務的船經過硫磺角（Azufra）附近的海上時，一群中國水手嘩變殺死了他，而在宿務，先行官路易斯·佩雷斯·達斯馬利尼亞斯（Luis Pérez Dasmariñas）和一支龐大的準備出征馬魯古群島征服德納地的遠征軍正等待着他。這個事件使遠征的希望破滅了，並且為1582年和1593年這許多年期間為香料而不斷展開的征服事業劃上了句號。⁽³⁰⁾

中華帝國的發展

中華帝國的內部進程和與外部的互動模式對早期菲律賓殖民進程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首先必須強調的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特別是在16世紀，在中國已發展起來的貨幣化經濟現象在西班牙

人到達東亞時得到了更大發展。影響貨幣化過程的諸多因素之一，就是在生產和服務領域，通過換回銀子，不斷“獲得”交納給國家的稅收，在糧食的庫存和其它產品方面，也獲得收入。在與外界的交流中，銀漸漸變成了特別珍貴的金屬和主要的暢銷產品。中國國內的這種活力使得在16世紀最後的幾十年，墨西哥的銀通過馬尼拉的大帆船開始大量流向中國大陸。

16世紀上半葉，明朝更加顯現出它對海洋的畏懼——放棄一切海上活動——這是面對東山再起的日本海盜倭寇⁽³¹⁾作出的反應。在中國，禁止所有非經限制性的納貢使臣而進行的對外海上貿易，同時，也禁止向海外移民。這就是所謂的海禁政策，即“禁止出海”⁽³²⁾。毫無疑問，不能忽視的是，當時中國沿海地區和靠近東南亞的邊境地區，還存在大量的與有組織海盜行徑有聯繫的非法貿易活動。各

種因素使得1567年在隆慶皇帝年間（1567-1572），批准福建省部分開放海上貿易，雖然仍絕對禁止與日本的貿易，但允許有限數量的中國帆船出海。這項新的貿易開放政策仍然嚴格限制外國人進入中國領土：對於企圖以各種方式進入中國大陸、在中國沿海建立一個如人們看到的⁽³³⁾類似葡屬澳門那樣的穩定的西班牙飛地、屢屢派遣使者而屢屢失敗的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來說，這個政策仍然給他們造成困難，仍然是一個法律制度上的限制。在允許外國人直接進入中國大陸的問題上，中國從意識形態到法律制度上的禁錮可以部分地解釋為甚麼西班牙人始終未能進入中國，同樣，它也可以解釋在較早的時候進入很小地區並極力阻止其它各種類似嘗試的葡萄牙殖民體系的活動。還可以解釋為甚麼菲律賓當局無法採取實用的政策來適應中華帝國與外部互動的這種模式。中國人和西班牙人與外部互動的實踐背後潛藏着的民族優越感具有本質上的差異，它就像一個在任何時候都無法逾越的障礙，凌駕於務實的地區貿易戰略之上，即使福建的中國人和菲律賓的西班牙人開展貿易互動成為可能，或者，在澳門接受葡萄牙人的存在。在西班牙人不斷到達菲律賓的最初的三十年中，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對征服中國的不切實際的幻想恰好表明了，他們把菲律賓當成了又一個“安第斯”，即大規模的大陸征服事業的橋頭堡。

在可以用來解釋1567年對福建的海上貿易解禁原因的各種因素中，突出的是日本海盜的減少和福建上層重商主義的壓力。福建人向東南亞移民和開展貿易，一方面與其經濟的增長能力不能與人口的增長相適應而帶來的人口壓力有關，同時作為一個需要進口大米的多山省份，尤其與其土地開墾能力相關。因此，貿易帶來的遷徙減輕了人口壓力，同時，既保持了與故土的聯繫，又建立了繞開官方禁律的基本食品供應和經濟致富的有效渠道。另一方面，事實是，福建省的土地貧瘠狀況恰恰促進了它與中國相鄰省份的海上交通，這就解釋了為甚麼當地的航海能有大發展的問題。中國大家庭的結構特點使得分散在東南亞各地重要商港（例如西屬馬尼

拉和後來的荷屬巴達維亞……）並與福建保持聯繫的集團結成家族式大企業，即公司，家族關係和信任降低了貿易過程中的消耗，並且便於在環印度洋和中國海之間形成大規模的海上貿易。⁽³⁴⁾

因此，正是海上對外開放的這個方面，能夠說明為甚麼出現了中國——基本上是福建省——對馬尼拉的貿易擴展和移民的增加，而這正是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貿易航線發展的基礎。這個移民和貿易過程得到了菲律賓當局的幫助，但它卻是在向更廣闊的區域包括整個東南亞貿易輻射過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必須注意的是，它的發展很快就超過了菲律賓當局希望的規模。⁽³⁵⁾ 17世紀在馬尼拉市郊中國人聚居的巴利安（Parian）縣接連不斷的暴動之後，菲律賓當局曾多次對馬尼拉的 sangleyes⁽³⁶⁾ 即中國移民進行大規模的種族清洗，但仍無法遏止移民潮，每次種族清洗過後若干年，移民潮又捲土重來。

關於葡萄牙人與中國的互動，須注意的是，他們比西班牙人多了六十年的優勢，在初期，他們就已經事先積累了通過印度洋和東南亞的商路開展貿易的經驗，由於這些地區包括中國在內的與外部互動模式的多樣性，這些經驗對他們非常有用。在東南亞地區和印度洋地區，互動貿易機制超越了不同法律、種族、宗教等等制度。一個世紀以來這些地區的商业僑民非常活躍，他們來自遙遠的地區，而那些地區往往都在具有戰略意義的沿海地區稱霸一方（阿拉伯、波斯、亞美尼亞、中國等）。

為了達到充當海上亞洲的主導或者中介這個目的，葡萄牙人在吸納外國貿易僑民方面所表現出的靈活性和能力，使得他們輕而易舉地躋身於印度洋和東南亞商業圈，並從整體上確定了其互動範圍。雖然葡萄牙在亞洲的殖民擴張側重於海洋和貿易，而不是陸地和徵稅，但它同樣依靠的是軍事行動，一般來說，是為了控制那些對建立印度航線具有重要作用的城市和戰略港口。例如，馬六甲的葡萄牙人與位於蘇門答臘島西端的亞齊蘇丹國的穆斯林之間由於爭奪紅海香料航線的控制權而產生敵對，因此葡萄牙人在1570-1580這十年期間制訂的各種計劃和進行的嘗試中，念念不忘的要征服東南亞的這

個穆斯林蘇丹國。⁽³⁷⁾在福建海上貿易開放之前，廣東省已經找到了一個實用的模式，以便自1557年起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從此，葡萄牙開始充當中國和日本貿易的中間人角色。

與日本互動

與在中國關係中發生的情況不同的是，葡萄牙商人和耶穌會傳教士來到日本南部沿海的最初三十年(1550-1580)中，這裡出現了一系列有利於加強貿易互動和貿易關係的制度、經濟、思想和政治局面。在日本，國家集權正在形成之中，封建貴族的政權結構為16世紀中葉的葡萄牙人提供了一個他們所熟悉的環境，但是舊的文化結構和權力結構仍很頑固。除此之外，日本的環境便於地區結盟，在國家重大政治戰略面前，它最能體現地區貿易利益。當時，中國和日本之間沒有來往和直接交通，雙方都需要獲得利益，卻不能直接交流，這種地緣格局也有利於葡萄牙人發揮中間人的作用。一方面，耶穌會宣揚的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被日本人看成是佛教特有的一個支系。由於語言知識的貧乏，基督教理論被放到次要位置，代之以強調禮儀和形式，採取類比的辦法。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當忘記，不論是耶穌會士還是葡萄牙人，他們都以印度次大陸沿海地區的果阿為亞洲擴張的基地，這裡同時還是佛教的傳播中心。

在日本九州島南部，葡日關係在初期的順利開展與伊比利亞人和中國人之間接觸的最初幾十年間接連不斷的衝突、困難和混亂形成對比。對於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來說，逐步瞭解中國人在與外部接觸中使用的森嚴禮儀、找到切實可行的交流戰略(例如“澳門模式”，在馬尼拉與 *sangleys* 的貿易等等)必定是充滿矛盾和衝突的長期而艱巨的工作。

隨着國家體制的加強和中央集權下的國家權力被牢牢掌握在豐臣秀吉為首的政府手中——1593年，豐臣秀吉曾調動分散而處於對立的當地大名的力量⁽³⁸⁾出征朝鮮，並把這次出征作為其野心勃勃的征服中國⁽³⁹⁾計劃的預演，但是，對朝鮮的領土擴張

以失敗而告終——16世紀最後二十年，日本的形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新西班牙立法會在1564年給烏爾達聶塔和黎加實比下達的指示中提出了遠征軍穿過太平洋到達日本群島的可能性。在西班牙，人們已經聽說葡萄牙人到達了日本，但是，與馬魯古群島的情形不同的是，依據1494年根據以反子午線劃分世界的〈托德西利亞斯協定〉(*Tratado de Tordesilhas*)⁽⁴⁰⁾，在亞洲地區，當時卡斯蒂利亞人提出了佔有日本群島的要求。但是，除了方濟各會和多名我會的修士為打破耶穌會在那裡的壟斷而進行的傳教行動之外，菲律賓沒有對它採取任何具體的擴張行動。

從到達菲律賓的最初年代起，西班牙人就已經在日本的船隻和西班牙佔領前菲律賓的船隻中發現了貿易關係的實據。我們來看黎加實比在1570年7月25日給菲利普二世的信中是如何以(馬尼拉)與中國和日本之間存在貿易往來為由，為自己放棄宿務(西班牙在該群島的主要飛地)而移師馬尼拉作解釋的：“這些摩爾人是很好的買賣人，因為有中國人和日本人在和他們交往。”⁽⁴¹⁾這樣，自1570年，當他們在馬尼拉發現了一個規模不大的日本僑民居住地的時候，便有機會與呂宋附近的日本船隻建立了某些直接聯繫。馬丁·德·戈地(*Martín de Goyti*)於1570年從呂宋寫的一封信中這樣說：

那個村子起火之後，下起了雨，這是摩爾人所期望的一場雨。村子損失很大，因為這是一個大村子，而且那裡貿易興旺。那裡曾居住過四十個已經結婚的中國人和二十個日本人；一些人在發生戰爭之前已經死去。他們上船來見船隊首領，其中有一個日本人，他戴着一頂“蒂內派”教徒⁽⁴²⁾式樣的帽子，好像是一個基督徒。問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回答說是，並說自己叫保羅；他喜歡上一幅畫，還要了一串念珠。據說，他是摩爾人炮手之一。⁽⁴³⁾

有證據表明，16世紀80年代初期，日本海盜曾出沒於呂宋島北部沿海地區，特別是在卡加延地

區。為了反擊日本海盜的騷擾，佩尼亞羅薩總督派胡安·保羅·卡利昂（Juan Pablo Carrión）率領一支小艦隊去“鎮撫”該地區，或者說，將其置於殖民者控制之下，並且從該地區驅除日本人。⁽⁴⁴⁾佩尼亞羅薩在1582年7月1日的一封信中說：

……我派遣的艦隊在卡加延地區遇到了兩艘敵船，或者，其中之一是日本人的船，另一隻當是當地外來居民的船，並與他們發生了戰鬥；在經過激戰殺死了二百個日本人之後（……）繼續航行，進入了卡加延河。正當艦隊在河口準備休息的時候，遇到了另外六隻日本人的船，由於人員和彈藥充足，艦隊打敗了他們。（……）之後，艦隊建立了後來成為要塞的營地，以便能夠保護自己。⁽⁴⁵⁾

我們找到了另一份材料證明日本海盜對呂宋的經常騷擾，這就是耶穌會士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ánchez）——征服中國計劃的推動者——在1582年第一次澳門之行之後寫的報告。中國當局阻止他返回菲律賓，這促成了他的日本之行。在下面這段話中，阿隆索·桑切斯向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者正面描述了他的日本之行：

……我決定登上即將出發的開始每年去日本之行的葡萄牙人的船⁽⁴⁶⁾，以便能回到呂宋。這是一條漫長而艱難常常遇到日本海盜威脅的路。為此，遠東教務視察員神父⁽⁴⁷⁾為了使我盡早返回並帶給陛下的報告和答覆，命令在日本各地的神父不惜代價為我搞到船，使我盡快起程。日本之行使呂宋及其群島的人感到非常高興，這可以使他們瞭解離得最近的國王和君主，以及在我們和平土地附近的鄰居，或者至少可以知道每年都要來這些群島並造成損失的日本敵人是從哪里來的。⁽⁴⁸⁾

16世紀80年代以及菲利普二世期望入主葡萄牙王室時期，在呈交給王室的有關從菲律賓向中



各島之間開展貿易時使用的菲律賓船模型

國和其它亞洲地區進行軍事擴張的各種計劃中，我們發現了一些以個人名義建議征服日本的內容。例如，在墨西哥的奧古斯丁教派的弗朗西斯科·奧爾特加的建議。新西班牙關於向中國萬曆皇帝派遣使臣的建議（同屬奧古斯丁教派的門多薩修士參與了這項建議）被擱置以後，弗朗西斯科·奧爾特加於1580年12月18日要求增兵支援菲律賓殖民地，以便開始在亞洲地區的領土擴張和進行傳教事業，他特別提到了日本。與當初派遣使臣的戰略相比，從這種倚重軍事的立場中可以看到，剛剛被免去菲律賓總督之職並被任命為征服中國計劃總監的弗朗西斯科·德·桑德（Francisco de Sande）的影響在擴大：

除此之外，日本群島接近呂宋群島，馬尼拉市就在呂宋，總督及其所轄的全部機構都在這裡。為了控制整個群島，同時也為了以陛下的名義與那些群島的人交往並進行貿易，使他們承認陛下為國王和統治者，必須有許多人來菲律賓，特別是為了效忠於陛下，還應當去暹羅和帕坦王國，以及大爪哇、小爪哇和大中華帝國，將一切都置於陛下的統治之下。⁽⁴⁹⁾

毫無疑問，菲律賓的擴張希望主要是針對中國大陸的。在各種征服中國計劃的實施過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與日本的戰略聯盟，在可能派遣的部隊中組成一支龐大的日本僱傭軍，從而使征服計

劃在後勤補給方面具有可行性。這個建議的提出是由於葡萄牙人從歷史久遠的衝突中瞭解到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存在着深刻仇恨。在這個方面的建議中，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澳門耶穌會學校校長、曾擔任日本傳教團的上級領導的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卡布拉爾（Francisco Cabral）提出的建議。菲律賓王家財庫管理人胡安·包蒂斯塔·羅曼（Juan Bautista Román）和阿隆索·桑切斯曾在澳門推動向帝國朝廷派遣使臣的嘗試，在失敗之後，弗朗西斯科·卡布拉爾在1584年6月25日寫信給菲利普二世國王。這位澳門耶穌會學校校長在信中建議，作為軍事力量的一個重要部分，應當通過日本耶穌會的協調，派遣一支由日本士兵組成的部隊來中國：

……陛下有日本，那裡的耶穌會神父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調動二、三千日本基督徒來這裡。從他們參加過的一、兩次戰爭中可以看出，不論是在海上還是在陸地，他們都是非常勇敢的人。用一個半士姑度或兩個士姑度的薪水，甚至更少的薪水，為了有所收穫，他們會很高興在這個事業中為陛下服務。⁽⁵⁰⁾

幾個月以後，又有一些關於這個問題的建議提出。1584年9月，在澳門，菲律賓王家財庫管理人胡安·包蒂斯塔·羅曼在關於中國的一份報告中說：

可以通過（耶穌）會神父們在日本抽調六、七千士兵，戰鬥性特別強的基督徒，中國人害怕他們甚於害怕死神。⁽⁵¹⁾

在1586年的“菲律賓各州備忘錄”關於征服中國的計劃中，作為當時西班牙王室駐菲律賓的總代理、耶穌會士阿隆索·桑切斯幾乎全盤接受了胡安·包蒂斯塔·羅曼在1584年提出的關於征服中國的後勤和戰略建議。

16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船隻為了打破葡萄牙人對中國商品貿易特別是對絲綢和瓷器的壟斷⁽⁵²⁾，加強了與菲律賓各港口的貿易往來。日本大名們把與西

班牙人的貿易聯盟看成是取代在日本的葡萄牙人壟斷的一種抉擇。在這個背景下，才發生了1584年當一艘西班牙船被風暴帶到日本海岸時⁽⁵³⁾，日本平戶（Hirado）大名對船員表示允許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在他的領土上建立一個商棧。⁽⁵⁴⁾在菲律賓，由於日本海盜對卡加延沿海地區不斷襲擊而形成的對日本人的懷疑態度卻使這個可能性化為泡影。⁽⁵⁵⁾

當時，日本正在加強其國家體制和中央集權，以使權力集中到由豐臣秀吉為首的帝國政府手中。豐臣秀吉曾調動分散而處於對立的當地大名的力量進行了第一次領土擴張，並把它作為其野心勃勃的征服中國計劃的預演，這就是1593年以失敗告終的出征朝鮮的戰爭。⁽⁵⁶⁾在這種形勢下，1586年，日本商人和大名代表組成的一行人來到了菲律賓沿海地區，在他們當中有一位皈依了基督教的大名小西行長（Konishi Yukinaga），他來到馬尼拉，表示可以派遣一支六千人的隊伍配合對馬魯古群島、渤泥或中國的入侵。⁽⁵⁷⁾菲律賓立法會院長聖地牙哥·德·維拉（Santiago de Vera）在1587年6月26日給菲利普二世的信中這樣談及這次來訪：

這位 Firando 的國王和另一位基督徒國王，他的朋友堂·奧古斯丁（Don Agustín），將遵照對他們的要求，派遣所有人員和武裝精良的士兵，從較近的地區前往渤泥、暹羅或馬魯古或大中國，這些都是他們的敵人。⁽⁵⁸⁾

在聖地牙哥·德·維拉看來，小西行長⁽⁵⁹⁾作為平戶大名的一位特使對馬尼拉的訪問有利於未來的行動，它開創了菲律賓和日本之間在後來若干年內的頻繁而複雜的外交關係。儘管菲律賓和日本之間建立了外交關係，但是，日本海盜對呂宋沿海地區經常性的騷擾並未停止，例如1592年5月3日在伊羅戈斯（Ilocos）沿海發生的日本海盜的掠奪性遠征。

在日本的第一次來訪之後不久，一些效忠於豐臣秀吉的大名開始了一次日本對菲律賓的征服行動。兩個阪井（Sakai）的商人 Harada Kiuyemon 和



1600年前後的馬尼拉灣

Harada Magoshichiro⁽⁶⁰⁾ 通過豐臣秀吉身邊的一個名叫 Hasegawa 的軍人，試圖使日本的當權者認識到用很少的幾百人就可能征服菲律賓。豐臣秀吉考慮了這個計劃，卻推遲了它的實施，因為當時他正在為征服朝鮮做準備，因此，他認為應當保持所有的兵力。他祇同意在1592年5月底派一名使節去馬尼拉，要求西班牙殖民者臣服於日本並派遣一名使臣到日本來，以便確認這種依賴和臣屬關係⁽⁶¹⁾。多明我會修士高母羨 (Juan Cobo)⁽⁶²⁾ 被指派去執行這個微妙的外交使命。當他在日本比較成功地與豐臣秀吉處理完關於遣使的工作後，在返回馬尼拉途經臺灣海峽時遭遇了沉船事故，這樣，當他在完成卡斯蒂利亞第一次出使日本的使命返回時，死於臺灣沿海地區部落居民的手中。⁽⁶³⁾

幾個月以後，日本大名之一 Harada 派遣的日本第二個使團到達菲律賓，這一次，日本使臣表現得比前一次隨和而友好，表示願意給修士們特別是方濟各會的修士提供在日本定居的機會，由此打破耶穌會傳教士的壟斷。⁽⁶⁴⁾ 在日本赴馬尼拉的第二個

使團中有一個名叫安東尼·洛佩斯 (Antonio López) 的日本基督徒，他與使節們的官方口徑相反，警告菲律賓當局說日本已經制定了征服菲律賓的新計劃。⁽⁶⁵⁾ 在這些計劃的威懾下，菲律賓總督戈麥斯·佩雷斯·達斯馬利尼亞斯 (Gómez Pérez Dasmariñas) 不得不派方濟各會佩德羅·包蒂斯塔 (Pedro Bautista) 修士率領第二個使團出使日本。豐臣秀吉在接見佩德羅·包蒂斯塔時承諾給方濟各會修士在日本定居的機會，儘管在1587年他曾禁止基督教佈道。⁽⁶⁶⁾

儘管如此，日本和菲律賓西班牙殖民地之間正常關係的時代還是到來了，商人和方濟各會佈道者的出現打破了葡萄牙人的長期壟斷，出現了價格競爭等等。當時的卡斯蒂利亞文獻都把豐臣秀吉視為一個威脅，他後來於1597年將三十六名基督徒釘十字架，其中包括日本基督徒、方濟各會和耶穌會的傳教士。1598年豐臣秀吉死後，對菲律賓的壓力才減輕了，日本征服這個群島的潛在威脅才得以消除。⁽⁶⁷⁾

結 論

西班牙在菲律賓群島殖民化的最初幾十年內，征服者和傳教士一般都把這個群島看作是對東亞各地擴張的一個跳板。1569年，米格爾·洛佩斯·黎加實比在他寫的關於菲律賓群島的《一覽》中，在論述菲律賓的重要性時強調，菲律賓由於離日本、中國、爪哇、渤泥、馬魯古和新幾內亞⁽⁶⁸⁾近而具有戰略意義。1564年新西班牙立法會頒佈的王室詔諭在涉及征服事宜時，僅將馬魯古群島排除在未來可能對亞洲地區進行的擴張之外，因為它是葡萄牙人的保留區域。在王室與菲律賓各位總督之間的通信中和王室採取的決定中曾多次提到，這是在亞洲的擴張中唯一的禁地，作為附帶內容的是禁止針對中國的軍事行動，這一點除了由於不可行和過於理想化的原因之外，另一個原因還在於，這樣的行動會與葡萄牙殖民體系的利益發生直接衝突，而在1581年菲利普國王入主盧濟塔尼亞王室之後，這個體系就已經落入他的控制範圍。⁽⁶⁹⁾

迫於塞維利亞商人的壓力而與印度委員會發生爭執和意識到維持殖民事業對於王國的國庫來說是一筆鉅大的經濟開支，1588年，菲律賓群島各國軍事委員會總代理、耶穌會士阿隆索·桑切斯這樣向西班牙王室介紹菲律賓在亞洲地區的戰略性質，並把它作為西班牙人之所以到菲律賓來的主要理由之一。在阿隆索·桑切斯修士作為對1586年菲律賓群島各國軍事委員會起草和批准的備忘錄的補充而提交給王室的《群島的性質和一般狀況一覽》中，菲律賓在東亞地區佔有特別的中心地位。一方面，當馬六甲海峽落入亞齊的穆斯林蘇丹國勢力範圍的時候，或者當澳門回到中國統治的時候，（一個西屬菲律賓）可以保證在日本的基督事業的連續性。除了通過這個特別的中心地位來保持葡萄牙人已經奪取的一切之外，阿隆索·桑切斯還認為，菲律賓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橋頭堡，通過這個橋頭堡，伊比利亞的基督事業在東亞的切實傳播才有可能，而他放在第一位加以強調的目標就是“大中國”：

……如果應當在大中國、交趾支那、占婆（Champá）、柬埔寨、暹羅和帕坦、爪哇和其它陸地和島嶼做些事情的話，不論是通過佈道還是遵從上帝指示的途徑，那裡的一切都應當是為了菲律賓，因此，陛下必須考慮的是，如果在那個如此廣闊而人煙稀少的地區有甚麼東西是必須繁衍的，那就是上帝在那裡播下的那粒種籽；在所有那些彼此距離遙遠和廣闊的世界上，菲律賓就是上帝提供給他們的一個要塞和堡壘。⁽⁷⁰⁾

儘管存在着這一類擴張主義的觀點，但各種因素阻礙了西班牙在東亞的領土擴張。最初，西班牙征服者對東亞擴張的慾望來源於（征服中國、馬魯古、渤泥……的計劃或企圖）對菲律賓地區的固守，而固守菲律賓是他們面對各種因素之間的衝突所採取的對策，例如中國對建立與西班牙人的關係在制度上的抵觸、中華帝國貿易和海洋政策開放的內部發展、在移民和貿易進程中開放馬尼拉航線以及在此過程中出現的福建人口和經濟問題、穆斯林蘇丹國不肯放棄馬魯古群島和棉蘭老島、逐漸構成對菲律賓威脅的日本中央集權和帝國的發展、以及葡萄牙人先一步出現在東亞造成的障礙，這些使該地區變成兩個王室之間的對抗之地，1581年菲利普國王入主葡萄牙王室從而使葡-西王國合二為一，這意味着必須保持並遵守在伊比利亞聯合王國之前劃分的邊界，該地區因此變得更加敏感。

從某種程度上說，1593年意味着一個時代的結束。菲律賓總督在前往馬魯古群島的船上被中國水手殺死就是一個信號：它預示着因此造成的在整個17世紀馬尼拉的西班牙人和中國人之間的關係緊張，並為在該地區所做的各種擴張企圖的失敗做了總結。但它並不意味在這一年之後，西班牙放棄了在這個地區的利益：此後，對柬埔寨和馬魯古群島的新的行動、16世紀末在中國沿海葡屬澳門附近建立的短暫的皮尼奧（Pinhal）飛地、在臺灣北部建立的拓居地，都連續不斷地顯示其不變的擴張主義野心，然而它們都遭到失敗的下場。

【註】

- (1) 1996年3月19日在巴塞隆納蓬佩·法布拉大學(Uni. Pompeu Fabra)舉行的“菲律賓史和西班牙在東亞的影響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的節選,並在 *Illes i Imperis* 雜誌第一期上發表,倫巴第(Lombard),1998,頁11-20。
- (2) 阿爾瓦雷斯·塔拉德里斯(Alvarez Taladriz),1979,頁3。
- (3) 連接中國沿海和遠東以及東南亞各個港口的商路受到西南夏季季風和東北冬季季風的影響(Chang Pin-tsun, 1995, 頁102-103)。商人、海盜或者中國福建移民利用11-2月間的東北季風推動前往呂宋、渤泥、爪哇或蘇門答臘,返程時他們以及東南亞的商人利用西南季風在春夏之末抵達中國沿海。珀塞爾(Purcell),1951,頁24。
- (4) 印度總檔案,塞維利亞,印度總檔案管理委員會,23,16,見伊塔格·努切拉(Hidalgo Nuchera)複製,1995,頁33,羅德里格斯(Rodríguez),1965, XIII, 文獻26, 頁406-510,費爾南德斯·德·納瓦雷特(Fernández de Navarrete),1946, XVII, 文獻5;印度總檔案管理委員會24,17,見伊塔格·努切拉複製,1995,頁145-149,費爾南德斯·德·納瓦雷特,1946, XVII, 頁37;印度總檔案管理委員會24,23,見伊塔格·努切拉複製,1995,頁271,羅德里格斯,1965, XIV, 文獻48, 頁117-131,費爾南德斯·德·納瓦雷特,1946, 17, 文獻44;印度總檔案管理委員會24,22,見伊塔格·努切拉複製,1995,頁308-309,在帕斯泰爾斯(Pastells)複製,1925-1936, I, CCVCV-CCVCVI 和 CCCI;印度總檔案管理委員會,24,1,12;見帕斯泰爾斯複製,1925-1936, I, CCXCIV。
- (5) 科斯塔(Costa),1950,頁314。
- (6) 費倫(Phelan),1967,頁10。
- (7) 威基(Wicki),1948-1988, VII, 頁158和印度總檔案管理委員會,23,16,見羅德里格斯複製,1965, XIII, 文獻26,費爾南德斯·德·納瓦雷特,1946, XVII, 文獻5,伊塔格·努切拉,1995,頁145-149。
- (8) 普塔克(Ptak)1992,頁25。
- (9) 本胡伊(Benjui), *Styrax tonkinensis*。
- (10) 印度總檔案管理委員會,23,16,見羅德里格斯複製,1965, XIII, 文獻26,費爾南德斯·德·納瓦雷特,1946, XVII, 文獻5,伊塔格·努切拉,1995,頁145-149。
- (11) 特謝拉(Teixeira),1970,頁25。
- (12) 船。
- (13) 貢薩羅·佩雷拉·馬拉馬克(Gonçalo Pereira Marramaque)。
- (14) 德納地(Ternate)、蒂多雷(Tidore)、馬基安(Makian)、莫蒂(Motir)、巴占(Batjan)島。
- (15) “德·黎加實比”,米格爾·洛佩斯(de Legazpi, Miguel Lopez)。
- (16) 關於葡萄牙在東亞的領土劃分,1529年簽署的薩拉格薩(Saragoça)協定規定,卡斯蒂利亞向葡萄牙出讓土地以換取一筆錢,由此初步結束了由於亞歷山大六世在贈予時無法預先加以確定而產生的關於托德西利亞斯(Tordesilhas)子午線不斷出現的各種解釋。根據托德西利亞斯協定,新發現的和傳教的領土被分配給卡斯蒂利亞人和盧濟塔尼亞人,當時香料群島和菲律賓群島幾乎還不為人知,僅僅有一些傳聞。
- (17) 馬魯古群島的總督貢薩羅·佩雷拉(Gonçalo Pereira)正式抗議並從當地驅除卡斯蒂利亞人的時間要晚於寫這封信的時間。1568年9月17日,一支盧濟塔尼亞艦隊對宿務島(Cebu)的卡斯蒂利亞軍隊作出軍事示威的態勢,(1568年10月14、19、20和28日)連續四次要求並警告卡斯蒂利亞人放棄該群島,並揚言如敢違抗,將全面發動進攻。在此之後,米格爾·洛佩斯·黎加實比終於同意了貢薩羅·佩雷拉的要求,儘管從後來他所採取的行動來看,那祇是策略上的讓步,而沒有履行他的諾言。(伊塔格·努切拉,1995,頁38)。
- (18) 如果考慮到一里格相當於六公里的話,那麼,這個距離正好符合實際情況。
- (19) 指路易斯·德·維拉斯科(Luis de Velasco)。
- (20) 威基,1948-1988, VII, 頁158。
- (21) 布萊爾和羅伯遜(Blair & Robertson),1973, III, 272。
- (22) 有許多文獻目錄中提到弗朗西斯科·德·桑德(Francisco de Sande)在渤泥發動的軍事行動,見吉仰·塔托(Guillen Tato),1971, 357-361。
- (23) 我們找到一些關於渤泥軍事行動的文獻,見聖·奧古斯丁(San Agustin),1975, 頁357-362。
- (24) 布萊爾和羅伯遜,1973, IV, 頁125-126。
- (25) 雅各布斯(Jacobs),1974, 頁3-7。
- (26) 印度總檔案,菲律賓,84,1,33。
- (27) 莫里那(Molina),1984,頁79。
- (28) 又稱莫羅內斯(Morones)和莫雷內斯(Morenes)。
- (29) 阿爾仁索拉(Argensola),1992, 頁187-300和科林·帕斯泰爾斯(Colin-Pastells),1904, II, 頁347-354。
- (30) 雅各布斯,1974, 頁7-8。
- (31) 中日海盜被中國人稱為倭寇,日語的發音為 wako。直譯的意思是“沒有生育能力的賊”。羅克斯坦(Rockstein),1973, 頁15-16。
- (32) 羅克斯坦,1973, 頁18和 Chang Pin-tsun, 1983, 頁4。
- (33) Chang Pin-tsun, 1983, 頁78-79。
- (34) 布魯斯(Blusse),1987, 頁97-155和蘇拉馬尼亞姆(Subrahmanyam),1993, 頁24。
- (35) 移民的迅速增加導致安東尼奧·德·莫爾加(António de Morga)在1596年7月6日寫給菲利普二世的信(布萊爾和羅伯遜,1973, IX, 頁266)中提到的1596年對馬尼拉的 sangleys 的限制和驅逐,並且引發了1603年馬尼拉中國僑民的暴動和後來的血腥鎮壓。
- (36) 這個詞的解釋似乎與中文的 shanglai 有關,意思為“來做生意的人”,或者是 sengli,閩南語的意思為“生意”。也可能是從中文的 changlai 派生出的詞意,即“經常來的

- 人”(Ch'en Ching-Ho, 1968, 頁36-37和舒爾茲(Schurtz), 1939, 頁93-94。菲律賓總督弗朗西斯科·德·桑德在1576年6月7日的一封信中給了一個較為合理的、現在流行的解釋:“……在這些群島,由於他們每年都來這個群島做生意,所以被稱為 *sangleyes*, 意思為‘來往的人’”。印度總檔案,菲律賓,6 (羅德里格斯, 1965, XIV, 頁407)。
- (37) 博克塞 (Boxer), 1985, III, 頁118-132。
- (38) 豐臣秀吉在日本當權期間(1582-1591),日本當地的貴族成員在他們的勢力範圍掌握着一部分重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權力,但正是在這個時期,他們面臨財政上的壓力和政治上的局限性,使得他們對當時計劃中的中央集權的統一過程無能為力,庫珀 (Cooper), 1994, 頁241。
- (39) Naohiro, 1991, 頁40-53。
- (40) 關於這件事情,可以查閱(馬德里)皇家歷史學院檔案中胡安·包蒂斯塔 (Juan Bautista Gessio) 的文件,穆尼奧斯叢書 (Colección Muñoz), 卷9-4803, 頁8-31。
- (41) 印度總檔案管理委員會, 24, 22, (Pastells & Torres Lanzas, 1925-1936, I, CCVCV-CCVCI 和 CCCI)。
- (42) 聖·卡埃塔諾 (S. Caetano) 建立的教職。在16世紀盛行,常常用於耶穌會成員。
- (43) 伊塔格·努切拉, 1995, 頁276-277。
- (44) 卡貝薩斯 (Cabezas), 1994, 頁178-180。
- (45) 印度總檔案管理委員會, 25。還可見瓦薩雷斯·達斯馬利尼亞斯 (González Dasmariñas) 總督在1582年6月16日寫的信(見布萊爾和羅伯遜, 1973, V, 頁27)。關於這個問題,同樣非常有意思的是王家財庫管理人胡安·包蒂斯塔·羅曼於1582年6月25日寫給新西班牙總督的信(印度總檔案管理委員會 25, 29, 3, 62)。
- (46) 阿隆索·桑切斯 (Alonso Sánchez) 於1582年7月5日或10日登船去日本(關於這一點,各種說法不盡相同)(Ricci, 1942, I, 頁214, 第5項)他搭乘的是商人蘭德伊羅 (Bartolomeu Vaz Landeiro) 的一艘大帆船,船長是安德烈·弗奧 (André Feio), 同船的還有耶穌會赴日本傳教團的修士佩德羅·戈麥斯 (Pedro Gómez)、阿爾瓦羅·迪亞士 (Álvaro Dias)、科里斯托旺·莫雷拉 (Cristovão Moreira) 和弗朗西斯科·皮雷斯 (Francisco Pires)。在經過十天航行之後,一場強烈的風暴使船遇險,在臺灣的一個海灘擱淺,船本身遭到嚴重損壞。在題為《歷史的回憶——我記憶中的地區》(*Memoriae historicae – Pontos do que me lembrar*)一書中,弗朗西斯科·皮雷斯在記載東亞的傳教活動時,詳細描述了在臺灣沿海這次遇險的情況 [Schutte], 1975, I, 頁338-393)。
- (47) 范禮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 (48) 印度總檔案,菲律賓,79, 2, 15。
- (49) 印度總檔案,菲律賓,84, 1, 33。
- (50) 印度總檔案,管理委員會,25, 21, 布林東 (Bourdon), 1960, 頁117-121。
- (51) (馬德里)皇家歷史學院檔案,胡安·巴蒂斯塔·穆尼奧斯叢書 (Colección Juan Baptista Muñoz), 卷18, 頁249-258。
- (52) 這一世紀最後的幾十年中,菲律賓立法會院長安東尼奧·德·莫爾加在不同的報告中曾多次談到日本在菲律賓的商業活動(布萊爾和羅伯遜, 1973, X, 頁84和XVI, 頁183-184)。
- (53) 這是一艘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巴托洛梅烏·瓦斯·蘭德伊羅的船,由船長維森特·蘭德伊羅 (Vicente Landeiro) 指揮,船上還有一些卡斯蒂利亞的下級修士。大風使這艘船偏離了航線,最後於1584年8月4日到達了日本沿海的平戶港 (Hirado)。
- (54) 有關這件事情的內容可見方濟各會修士胡安·德·布拉索西亞 (Juan de Plasencia) 1585年6月18日的信(印度總檔案,菲律賓,84, 2, 67)和馬尼拉立法會院長聖地牙哥·德·維拉 (Santiago de Vera) 1585年6月20日的信(印度總檔案,菲律賓,18, 2, 30)。
- (55) 奧塞霍 (Ausejo), 1972, 頁420。
- (56) Naohiro, 1991, 頁40-53。
- (57) 博克塞, 1993, 頁259。
- (58) 印度總檔案,菲律賓,34。
- (59) 在西班牙的文獻中,被稱為“費蘭多 (Firando)”或者“費甘多 (Ficando)”的國王。
- (60) 在16世紀的西班牙文獻中,被稱為“法蘭達 (Faranda)”。
- (61) 吉爾 (Gil), 1991, 頁36-42。
- (62) 傳教活動與西班牙的殖民活動是不可分割的,在這個環境中,1588年剛剛來到馬尼拉的多明我會的修士從馬尼拉第一位主教多明戈·德·薩拉查 (Domingo de Salazar) 那裡接受的任務就是在巴利安 (Parián) 的 *sangleys* 居民中傳教。高母羨 (Juan Cobo) 在大約四年的時間裡從事這件工作,卻無果而終,在此期間,他曾努力學習中國話。在學習中國話並努力融入在馬尼拉形成的由來自中國福建省的移民組成的社會的過程中,翻譯了書名為 *Beng Sim Po Cam (Espejo rico del buen corazón)* 的箴言、警句和格言集。中文原題為《明心寶鑒》(*Mingxinbaojian*) (高母羨, 1997)。
- (63) 吉爾, 1991, 頁43-48。
- (64) 16世紀,曾有人在馬尼拉將他給菲律賓總督的《回憶錄》翻譯為西班牙語,印度總檔案,菲律賓,6, 7, 107和印度總檔案管理委員會 25, 50 (吉爾, 1991, 頁49-50)。
- (65) 印度總檔案,菲律賓,85。
- (66) 印度總檔案,菲律賓,6, 8, 114 (吉爾, 1991, 頁56-57和帕斯泰爾斯和托雷·蘭薩斯, 1925, III, CCCXXIX-XXV)。
- (67) 奧塞霍, 1972, 頁422-427和博克塞, 1993, 頁164-166。
- (68) 布萊爾和羅伯遜, 1973, III, 頁58-59。
- (69) 奧塞霍, 1972, 頁398-399。
- (70) 科林·帕斯泰爾斯, 1904, II, 頁371。

【參考書目】

阿爾瓦雷斯·塔拉德利士,若澤·路易斯 (Alvarez Taladriz, José Luis) —《方濟各修士進入日本歷史筆記》(*Notas para la historia de la entrada em Japon de los franciscanos*)。

- 《西班牙在遠東：方濟各會在菲律賓、中國、日本，1578-1978》(*España en Extremo Oriente: Filipinas, China, Japón, presencia franciscana, 1578-1978*)，維克多·桑切斯·吉爾出版社 (Víctor Sanchez Gil)，馬德里 (Madrid)；伊比利亞-美洲檔案叢書 (*Publicaciones Archivo ibero-americano*)。錫斯內羅斯出版社 (Cisneros)，1979，3-32。
- 阿爾仁索拉，巴托洛梅烏·萊昂納多·德 (Argensola, Bartolomé Leonardo de) — 《征服馬魯古群島》(*Conquista de las Islas Malucas*)。阿隆索·馬丁出版社 (Alonso Martín)。馬德里：米拉瓜諾出版社 (Miraguano)，1992。
- 奧塞霍，路斯 (Ausejo, Luz) — 《16世紀的菲律賓人》(*The Philippine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芝加哥大學，1972。
- 布萊爾，埃瑪·海倫 (Blair, Emma Helen)；詹姆士·亞歷山大·羅伯遜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菲律賓群島，1493-1898》(*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黎剎 (Rizal)：《兄弟們》(*Cachos Hermanos*)，曼達盧永 (Mandaluyong)，1973。
- 布魯塞，奧漢·萊昂納多 (Blussé, Johan Leonard) —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阿姆斯特丹，1987。
- 布林東，萊昂 (Bourdon, Leon) — 《16世紀末一個從廣東進攻中國的計劃》(*Un projet d'invasion de la Chine par Canton à la fin du XVI siècle*)。第三屆葡萄牙-巴西研究國際研討會紀要 (*Actas do III Colóquio Internacional de Estudos Luso-Brasileiros*)。里斯本，1960，pp. 97-121，卷I。
- 博克塞，查爾斯·拉爾夫 (Boxer, Charles Ralph) — 《葡萄牙在南亞的征服和貿易，1500-1750》(*Portuguese conquest and commerce in Southern Asia, 1500-1750*)。漢普郡 (Hampshire)：《集注》(*Variorum*)，高爾出版社 (Gower Publishing House)，1985。
- 《日本的基督世紀 (1549-1650)》(*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曼徹斯特 (Manchester)：卡爾卡納特出版社 (Carcant Press)，1993。
- 卡貝薩斯，安東尼奧 (Cabezas, Antonio)；博克塞，查爾斯·拉爾夫 — 《日本的伊比利亞世紀。西班牙-葡萄牙人在日本 (1543-1643)》(*El siglo ibérico de Japón. La presencia Hispano-portuguesa en Japón, 1543-1643*)。巴利亞多利德 (Valladolid)：巴利亞多利德大學，1994。
- 卡斯帕里斯·馬貝特 (Casparis-Mabbet) — “公元前1500年東南亞的宗教和民間信仰” (*Religion and Popular Beliefs of Southeast Asia Before c. 1500*)。《劍橋東南亞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尼古拉斯·塔靈出版社 (Nicholas Tarling)。康橋：康橋大學出版社，卷1，1992，頁276-334。
- 文獻彙編 (CDIU) — 《未發表過的關於發現、征服和海外領地組織的文獻彙編》。馬德里，皇家歷史研究院，1886-1932。
- Ch'en Ching-Ho — 《16世紀菲律賓的中國僑民》(*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hilippines*)。東京：東亞文化研究中心，1968。
- Chang Pin-tsun — 《中國的海上貿易：16世紀福建的情況》(*Chinese Maritime Trade: The case of Sixteenth-Century Fu-chien[Fukien]*)。普林斯頓 (Princeton)：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1983。
- 《15世紀東南亞的第一個中國移民城市》(*The First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全球的機會》(*The Global Opportunity*)。菲利普·費爾南德斯·阿爾梅多出版社 (Felipe Fernández Arnedo)。奧爾德肖特 (Aldershot)：《集注》，1995。
- Chang T'ien-tse (張天澤) — 《1514至1644年期間的中葡貿易》(*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葡中資料彙編》(*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萊頓 (Leiden)，1934。
- 高母羨 (Cobo, Juan) — 《明心寶鑒》(*Rico espejo del buen corazón, Beng Sim Po Cam*)。1590年高母羨翻譯了范立本的《明心寶鑒》，馬內爾·奧雷出版 (Manel Ollé)，巴塞隆納：半島出版社 (Península)，1997。
- 科林，弗朗西斯科 (Colín, Francisco) — 《耶穌會弗朗西斯科·科林神父在菲律賓群島的耶穌會傳教工作》(*Labor Evangélica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la Islas Filipinas por el P. Francisco Colín de la misma Compañía*)。保羅·帕斯泰爾斯出版社 (Pablo Pastells)。巴塞隆納：菲律賓煙草總公司 (Compañía General de Tabacos de Filipinas)，1994。
- 庫帕，邁克爾 (Cooper, Michael) — 《羅德里格斯翻譯，一個早期到達日本和中國的耶穌會士》(*Rodriguez the interpreter. An early Jesuit in Japan and China*)。紐約：韋爾赫希爾 (Wearherhill)，1994。
- 科斯塔，奧拉西奧·德·拉 (Costa, Horacio de la) — 《薩拉查主教管理下的菲律賓的教會和國家，1581-1594》(*Church and state in the Philippin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Bishop Salazar, 1581-1594*)。西班牙美洲歷史回顧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 (1950): 314-335。
- 費爾南德斯·德·納瓦雷特 (Fernández de Navarrete) — 《F. 德·納瓦雷特編輯的文獻和手稿文集》(*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y Manuscritos compilados por F. de Navarrete*)。馬德里：海事博物館，1946。
- Fok Kai Cheong (霍啟昌) — 《澳門工作模式》(*The Macau Formula at Work*)。《葡-中關係研究》(*Estudos de História do Relacionamento Luso-Chinês*)。安東尼奧·瓦斯貢塞羅斯·德·薩爾達尼亞和若熱·曼努埃爾·桑托斯·阿爾維斯出版社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 Jorge Manuel Santos Alves)。里斯本：葡萄牙東方基金會，1996，頁219-234。
- 吉爾，胡安 (Gil, Juan) — 《貴族和武士。16-17世紀的西班牙和日本》(*Hidalgos y samurais. España y Japón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馬德里：聯合出版社 (Alianza Editorial)，1991。

- 吉仰·塔托·胡利奧·F. (Guillen Tato, Julio F.) —《海事博物館藏費爾南德斯·德·納瓦雷特文獻集目錄》(*Indice de la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de Fernández de Navarrete que posee el Museo Naval*)。嫩德恩 (Nendeln)，列支敦士登 (Liechtenstein)：克勞斯-湯普森有限公司 (Kraus-Thompson Organization Limited)，1971。
- 霍爾，肯尼斯·R. (Hall, Kenneth R.) —《早期東南亞的海上貿易和國家發展》(*Maritime Trade and State Development in Early Southeast Asia*)。檀香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85。
- 伊塔格·努切拉，帕德利希奧 (Hidalgo Nuchera, Patricio) —《菲律賓之最》(*Los primeros de Filipinas*)。馬德里：米拉瓜諾出版社—博利費莫叢書 (Ediciones Polifemo)，1995。
- 雅各布斯，休伯特 (Jacobs, Hubert) —《*Documenta Malucensia*》。羅馬：耶穌會歷史研究所 (Jesuit Historical Institut)，1980。
- 倫巴第，德尼斯 (Lombard, Denys) —“L'Eurasie a la veille du 'moment' iberique”。《*Illes i Imperis. Estudis d'història de les societats en el món colonial i post-colonial*》，nº 1，頁 11-20。巴塞隆納：蓬佩·法布拉大學 (Universitat Pompeu Fabra)，1998。
- 莫利納，安東尼奧·M. (Molina, Antonio M.) —《菲律賓史》(*Historia de las Filipinas*)。馬德里：西班牙文化出版社 (Ediciones de Cultura Hispánica)，1984。
- Naohiro, Asao —《16 世紀的統一》。《劍橋日本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John Whitney Hall 出版社。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1，卷 4，頁 40-95。
- 帕斯泰爾斯，保羅，托雷斯·埃·蘭薩斯·埃·納瓦斯·德爾·瓦雷 (Pastells, Pablo, Torres y Lanzas y Navas Del Valle) —《菲律賓全史。塞爾維亞印度檔案中關於菲律賓群島的文獻目錄》(*Historia General de Filipinas. Catalogo de los documentos relativos a las islas filipinas existentes en el Archivo de Indias de Sevilla*)。巴塞隆納，1925-1936，9 卷。
- 費倫，約翰·萊迪 (Phelan, John Leddy) —《菲律賓的西班牙化。西班牙的目的和菲律賓的對策 1565-1700》(*The Hispaniz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Spanish aims and Filipino Responses, 1565-1700*)。邁迪遜 (Madison)，密爾沃基 (Milwaukee)：威斯康辛大學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7。
- 普塔克，羅德里希 (Ptak, Roderich) —《通往香料群島的北方貿易之路：南中國海—蘇祿地區—北馬魯古，(14 世紀到 16 世紀初期)》。《群島 43 (1992)》：27-56。
- 《1500 年前後中日海上貿易：商人、港口和網絡》(*Sino-Japanese maritime Trade, circa 1550: Merchants, Ports, and Networks*)。《日本的基督世紀》。里斯本，1994，頁 281-311。
- 帕塞爾，維克多 (Purcell, Victor) —《中國人在東南亞》(*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51。
- 安東尼奧·里德出版社 (Reid, Anthony, ed.) —《早期現代貿易、權力和交替中的東南亞》(*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Trade, Power and Relief*)。伊薩卡 (Ithaca)：康內爾大學出版社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 雷塔納，W·E. (Retana, W. E.) —《菲律賓藏書檔案：歷史、科學、文學和政治及書目研究》。5 卷。馬德里：Imprenta de la viuda de Minuesa de los Ríos, 1897。
- 利瑪竇 (Matteo Ricci) —《基督教遠征中國史》(*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l' Cristianesimo in Cina*)。Pasquale d'Elia 出版社，卷 1。羅馬：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 羅克斯坦，埃德華·D (Rockstein, Edward D.) —《海上貿易和日本海盜：明朝時期中國和朝鮮的對策》(*Maritim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Chinese and Korean Responses in Ming Times*)。《Asia Pacific Quarterly of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5.2 (1973)。
- 羅德里格斯，伊薩希奧 (Rodriguez, Isacio) —《菲律賓耶穌聖名之下的奧古斯丁教區史》(*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agustiniana del Santísimo Nombre de Jesús de Filipinas*)。馬尼拉：奧古斯丁研究出版社 (Ediciones Estudio Agustiniano)，1965。
- 聖·奧古斯丁，加斯帕爾·德 (San Agustin, Fr. Gaspar de) —《征服菲律賓群島：謹慎者堂·菲利普二世的軍隊掀起的風暴；聖奧古斯丁教派的信徒們掀起的的精神風暴》(*Conquista de las islas Philipinas: la temporal por las armas del Señor Don Phelipe Segundo El Prudente; y la espiritual, por los religiosos del Orden de San Agustín*)。曼努埃爾·梅利諾出版社 (Ed. de Manuel Merino)。馬德里：曼努埃爾·魯伊斯·德·穆爾加印刷 (Imprensa de Manuel Ruiz de Murga)，馬德里，CSIC，1975。
- 舒爾茲，威廉·利澤 (Schurtz, William Lythe) —《馬尼拉的船》(*El galeón de Manila*)。佩羅羅·奧爾迪斯·阿爾門格爾 (Pedro Ortiz Armengol) 翻譯。萊昂希奧·卡佈雷拉出版社 (Ed. de Leoncio Cabrera)。馬德里：西班牙文化叢書，1939。
- 舒特，約瑟夫·弗朗茲 (Schutte, Josef Franz) —《日本的歷史文獻》(*Monumenta Historica Japoniae*)。卷 1，羅馬，1975。
- 蘇拉馬尼亞姆，桑賈伊 (Subrahmanyam, Sanjay) —《葡萄牙帝國在亞洲 1500-1700》(*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1500-1700*)。倫敦：朗文，1993。
- 文德泉 (Manuel Teixeira) —《堂·麥爾什奧爾·卡爾內羅，澳門仁慈堂的創建者》(*D. Melchior Carneiro. Fundador da S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澳門：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1970。
- 威基，約瑟夫 (出版) (Wicki, Josef [ed.]) —《印度文獻》(*Documenta Indica*)。羅馬：耶穌會歷史研究所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J.)，1948-1988。18 卷。

蔚玲譯